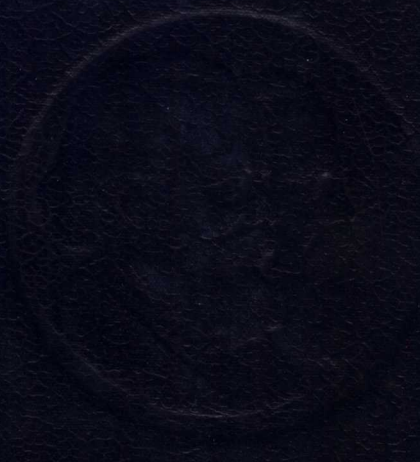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八卷

人 民 出 版 社

1961年 北京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八卷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 900×1220 毫米 $\frac{1}{32}$ · 印張 25 $\frac{1}{8}$ · 插頁 8 · 字數 587,000

1961年10月第1版

1961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 1001·506 定價(四) 3.50元

第八卷說明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收集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1 年 8 月至 1853 年 3 月期間所写的著作。

在欧洲反动势力猖獗时期到来的条件下，馬克思和恩格斯把进一步从理論上总结 1848—1849 年各个革命战役的經驗、保存和积蓄革命无产阶级的力量、从理論上培养无产阶级政党的干部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这一时期，馬克思和恩格斯要求自己的战友勤学苦练掌握各种知識，并使他們有充分准备去迎接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新的高潮的到来。

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进一步发展自己的革命理論具有重大的意义。当时政治经济学成了馬克思的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对象。馬克思在 1848 年以前把注意力放在从哲学上論证科学共产主义，在 1848—1849 年致力于政治思想的研究，而在五十至六十年代則把经济学說的研究提到首位。1850 年底馬克思恢复了他早在四十年代就开始的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的研究工作。馬克思希望很快就結束这项工作，但当时他沒有能够实现自己的計劃。这不仅由于馬克思的流亡生活非常艰苦，不仅由于著作无处出版，同时也由于他对科学的一絲不苟的認真态度促使他批判地去研究不断出現的新的資料和文献，分析现实生活所提供的日新月異的事实和材料。从馬克思在准备写作时所作的筆記可以看出，除了

研究經濟科学本身而外，他还广泛研究了許多有关技术史、文化史、数学、农业化学的著作以及在研究政治經濟学時使他感到兴趣的其他科学著作。馬克思对任何科学領域中的每一步发展都非常注意，而且能够批判地掌握人类思想的一切新的成就。

这一时期，恩格斯的理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軍事科学和軍事学术史。由于1848—1849年革命斗争的需要，恩格斯当时已經从事于軍事問題，尤其是武装起义問題的研究。1850年11月，恩格斯迁居曼彻斯特以后，就着手对軍事进行系統而認真的研究。“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46—577頁）一文手稿及本卷所載的“英国”一文就是这个研究的初步成果。此后，恩格斯曾經打算写一部关于1848—1849年战争，特别是关于匈牙利革命战争的著作。恩格斯深刻地認識到武装斗争問題在未来的革命事件中必将起重大的作用，这是促使他研究軍事的主要原因。

在曼彻斯特时，恩格斯除了研究軍事科学以外，还研究語言及語言学問題。恩格斯精通許多种欧洲語言，1850年12月，他又着手研究俄罗斯語言及其他斯拉夫系語言。他研究一个民族的語言是同研究該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文学結合起来进行的。恩格斯研究語言不仅是出于科学的兴趣，同时也由于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所进行的及行将进行的国际革命的实际工作的需要。

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理論研究和組織无产階級政党、以科学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党的干部等党的政治工作結合在一起。这一时期，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們的支持者同維利希—沙佩尔宗派集团的斗争达到了非常尖銳的程度，这个宗派集团在1850年9月时就已經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制造分裂。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击了

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中的宗派主义分子，揭发了各流亡团体之間的傾軋以及他們策划阴谋和暴动的冒险計劃，从而坚决地捍卫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原則，論证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已經到来的反动时期中所应采取的策略。

尽管这一时期要在报刊上捍卫自己的观点是很困难的，但馬克思和恩格斯並沒有停止写政論文章。在好几年中，他們不断在宪章派的机关刊物“寄語人民”和“人民报”上著文捍卫对于重大的政治問題的无产阶级观点，发表对当前的重大事件的評論。从1851年秋天起，一連十多年，馬克思經常为当时美国的进步报纸“紐約每日論壇报”撰稿。通过撰稿，馬克思得以在几乎完全沒有工人报刊的情况下，繼續进行战斗的政論活动，并影响社会輿論（尽管是間接地），使其有利于无产阶级政党。由于为“紐約每日論壇报”撰稿的工作可能占去馬克思的全部時間，而使他不能从事他和恩格斯认为具有首要意义的政治經济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所以为該报所写的許多篇論文和通訊是应馬克思的要求由恩格斯执笔的。作为本卷第一篇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組論文，就是这样写成的。

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著作中，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闡明了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前提、性质和动力。恩格斯的这些論文是馬克思主义的两位奠基人在这段革命时期中通过“新萊茵报”这个讲坛所发表的言論的总结。通过对革命教訓的分析，恩格斯指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关于通过革命的道路来統一德国并对它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进行彻底的民主改革的政綱的正确性。恩格斯在他的論文中清晰地描繪出了德国革命所处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他研究了当时德国的社会經济条件，指出了这些条

件对运动的进程的影响，分析了革命的各个重要阶段以及各阶级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揭示了革命失败的原因。恩格斯的这一著作是对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的卓越典范。

在这一著作中，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原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具体化。通过 1848—1849 年德国的事例，恩格斯指出了社会的经济基础在历史上的决定性作用，分析社会的经济基础对于了解政治历史和社会思想历史的必要性，阶级斗争在对抗性社会的发展中的作用，以及革命的一个规律性：革命反映人民的迫切需要和要求，而腐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则不让这些需要和要求得到满足。恩格斯依据马克思的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一深刻的思想，把革命看作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这种力量使得一个国家“五年就走完在普通环境下一百年还走不完的路程”。（見本卷第 38 頁）

恩格斯根据丰富的事实材料分析了德国革命的动力，发展了他和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所贯穿的思想：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不能起领导作用，自由资产阶级已爬到反革命立场上去，出卖了它在反封建斗争中的必要同盟军农民的利益。这个结论不仅对德国以后的历史，而且对其他许多国家以后的历史都非常重要。弗·伊·列宁在分析 1905—1907 年俄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而坚持他所提出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这一思想时，就曾不止一次地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结论。

恩格斯在这一著作中用很大篇幅分析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们的作用，指出这些人，每当革命的紧要关头就表现出政治上的近视、怯懦和动摇，从而使革命遭到失败。恩格斯抨击小资产阶级

領袖們的“議會迷”，抨擊他們迷信議會制度萬能，而不想越出憲法的範圍，不敢依靠人民，不敢依靠武裝群眾的支持。恩格斯指出，工人階級是革命的最徹底的真正的戰鬥力量，他們“是代表整個民族的真正的和被正確理解的利益的”。（見本卷第 106 頁）

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關於革命鬥爭的策略的總結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恩格斯要求革命的階級和它的政黨要堅決、勇敢、有自我犧牲精神、要善於實行果斷的進攻。他寫道：“在革命中，也像在戰爭中一樣，永遠需要勇敢地面對敵人，而進攻者總是處於有利地位。”（見本卷第 82 頁）弗·伊·列寧非常重視這個著作中所闡述的這一思想：“在革命中常常有這樣的時候，那時不經過鬥爭而把陣地交給敵人，會比在鬥爭中遭受失敗要更加使群眾感到沮喪。”（“列寧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384 頁）

“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這一著作奠定了馬克思主義關於武裝起義學說的基础。在這一著作中第一次表述了這樣一個原理：“起義也正如戰爭或其他各種藝術一樣，是一種藝術”（見本卷第 102 頁），並且規定了革命政黨在起義中所應遵循的一些最重要的原則。弗·伊·列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起義的學說，他指出，這些原則總結了過去一切革命在武裝起義方面的教訓。

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非常注意德國革命中的民族問題。他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抨擊了奧地利和普魯士統治階級所執行的民族壓迫和挑撥各民族關係的政策。恩格斯堅決斥責了德國資產階級對波蘭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的民族解放運動所採取的叛變立場，並論證了德國民主派中的無產階級派的徹底的國際主義立場——支持給這些民族以獨立的要求。

恩格斯的著作也談到了當時作為奧地利帝國組成部分的斯拉

夫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等)的民族运动問題。大家知道,在1848—1849年革命初期,当奥地利的捷克人和其他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中出现了强烈的革命民主主义的趋势时(1848年6月的布拉格起义、农村中的群众性的反封建运动),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些民族的斗争抱着深切的同情。而在奥地利发生的捷克人和其他斯拉夫运动中的民主力量被镇压下去以后,资产阶级地主右翼分子重新占了上风,哈布斯堡王朝和俄罗斯沙皇政府得以利用这些民族的民族运动来反对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因此,从来以革命的利益为准繩来看待民族問題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就改变了他們对这些民族的民族运动的态度。馬克思和恩格斯把革命的利益,把反对革命的敌人、首先是反对当时作为欧洲反动势力主要支柱的沙皇制度的斗争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因此,也正因为如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反对过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运动。”(“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34—335頁)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著作以及恩格斯在这以前所写的論文“匈牙利的斗争”和“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193—207頁和第322—342頁),除了对奥地利的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在1848—1849年具体条件下所起的客观作用的正确评价之外,也包含着一些对这些民族的历史命运的錯誤論断。恩格斯发挥了这样的思想:这些民族已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而存在,被較强的邻国所吞并将是它們不可避免的命运。恩格斯之所以作出这样的結論,主要是由于当时他已經形成的关于弱小民族的历史命运的总的观念。恩格斯认为,在資本主义条件下历史发展进程的基本趋势是集中,是大国的形成,因而一定会导致較大民族对小民族的吞并,英国的威尔士人,西班牙

的巴斯克人，法国的下布列塔尼人，以及領土被美国侵占的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的后裔克里奥洛人的情况就是这样。恩格斯正确地看到了資本主义所固有的集中即大国的形成这一趋势，但他沒有考虑到另一种趋势——弱小民族反对民族压迫爭取自身独立的斗争，以及他們力图建立自己的国家組織的願望。随着更广泛的人民群众参加民族解放斗争，随着他們的觉悟的提高和組織性的加强，弱小民族（包括奥地利的斯拉夫民族在內）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就愈来愈具有民主和进步的性质，同时也扩大了革命斗争的战綫。历史已經证明，过去是奥地利帝国組成部分的斯拉夫弱小民族，不仅有能力走上民族独立发展的道路，建立起自己的国家組織，而且加入了最先进的社会制度的創造者的行列。

本卷所刊載的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科学共产主义的最卓越的著作之一。这一分析历史事件并从理論上加以概括的天才著作，同时也是革命政論的真正杰作。用威·李卜克內西的話來說，馬克思的这一著作“把塔西佗的严肃的忿怒、尤維納利斯的尖刻的諷刺和但丁的神圣的怒火綜合在一起了”。（“回忆馬克思恩格斯”中文版第 107 頁）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可以說是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階級斗争”（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9—125 頁）这一著作的繼續。如同在前一本著作中一样，馬克思是用他所发现的社会发展規律、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階級斗争的理論作为利器来闡明法国革命时期的历史的。

由于馬克思运用了唯物主义辯证法，所以他能在事变后立即写成的著作中对 1848 年法国革命的几个基本阶段作出經典性的分析，仔細考察了第二共和国时期階級力量的配置，科学地深刻關

明了1851年12月发生的路易·波拿巴反革命政变的真正原因。恩格斯写道：“他对当前活的历史的理解如此卓越，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把事变的意义洞察得如此明白，这真是无与伦比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221頁）

馬克思通过法国的具体例子，指出了作为历史的动力的阶级斗争的作用。馬克思追溯了在不同的革命阶段各个政党在立場上的重大改变，揭露了这些政党的阶级本质，以及他們的活动的隐蔽的动因。馬克思关于政党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关于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本阶级群众的关系的深刻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馬克思以第二共和国时期活跃于法国政治舞台上的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为例，指出应该把这些或那些政党的言論和幻想同他們真正的性质严格区别开来。同时，馬克思预先警告說要反对这样一种庸俗的观念：好像一个阶级的思想家本人在实际中一定要按这个阶级固有的生活方式生活。所以，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无须一定是小店主。使他們成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的是他們的同小资产阶级生活范围狭隘性相适应的理論見解，因此，他們在理論上的任务和决定也就和小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在实际中促使小资产阶级去做的一样。“一般說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們所代表的阶级間的关系，都是这样。”（見本卷第152頁）

对于1851年12月2日政变的原因的唯心主义解釋，把整个問題都归之于篡位者路易·波拿巴和他的党羽的阴谋，因而也就有意无意地夸大了篡位者的个人作用。同唯心主义的解釋相反，馬克思认为波拿巴的政变是事件的以前进程的必然結果。他认为

这次政变是执政的資產階級在共和国时期的一系列反革命活动的合乎邏輯的結果，是經常进攻人民的民主权利，不断侵犯革命成果的合乎邏輯的結果。这次政变是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性的发展的合乎規律的結果，是懼于“紅色怪影”而向波拿巴派阴谋家节节让步的資產階級政党的怯懦而动搖的政策遭到破产的合乎規律的結果。馬克思指出，和十八世紀末叶的革命相反，十九世紀中叶法国資產階級革命是走“下坡路”的，革命的領導权落入了愈来愈右的政党手中。“二月革命的最后街垒还没有拆除，第一个革命政权还没有建立，革命就已經这样开起倒車来了。”（見本卷第 145—146 頁）馬克思的这种思想說明了在資產階級已經成为反人民、反革命的力量，而无产階級的力量还不足以阻撓反革命进攻的条件下資產階級革命的特点。这种情况特別明显地表現出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不稳固，并且为各种复辟企图創造了条件。

馬克思特別着重指出資產階級民主的局限性和自相矛盾的性質，指出它是虛有其表的。第二共和国的宪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馬克思說得好，这个宪法的每一节“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詞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廢除自由”。（見本卷第 135 頁）

馬克思闡明了在法国建立起反革命的波拿巴制度的真正原因，对波拿巴主义的本质作了深刻的評述。这个主义的特征就是：在各个階級之間看風轉舵，国家政权貌似独立，蠱惑性地向社会各阶层呼吁，以便掩飾它的維護上层剝削分子的利益的行为。馬克思揭露采取波拿巴独裁政权形式的資產階級极端反革命分子的无耻的統治手段，指出資產階級为了保持剝削制度，把政权拱手让給了最狂妄无耻的冒險家，听任实行軍閥式的血腥鎮压，利用罪犯，

采取詐騙、賄賂、露骨的煽動以及其他種種卑鄙醜惡的手段。馬克思揭露了波拿巴制度的這些令人厭惡的特征，有先見之明地預言，被深刻的內部矛盾震撼着的復辟的波拿巴君主制必然會遭到滅亡。

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很注意法國的農民和他們對波拿巴政變的態度。馬克思一方面指出波拿巴在農民中的鼓動是有成績的，同時也着重指出，充當路易·波拿巴的支柱的，不是革命的農民而是保守的農民。這部分農民所以擁護路易·波拿巴，是由於他們政治上的落后和閉塞，由於同城市的文明生活隔絕，由於彼此隔離的分散的小農經濟的生活條件本身所造成的眼光短淺。把農民看做不過是勒索捐稅的對象的資產階級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所制定的政策，使農民厭棄革命，而支持路易·波拿巴。促使他們這樣作的另一個原因是這些農民私有者眷戀自己的小塊土地，把拿破侖王朝當作自己的傳統的庇護者。馬克思着重指出農民的兩面性，他寫道：“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農民的開化，而是農民的迷信；不是農民的理智，而是農民的偏見；不是農民的未來，而是農民的過去……”（見本卷第 218 頁）馬克思分析了小土地所有制的經濟發展，得出結論說，隨著小農經濟的破產，隨著高利貸資本家對它的盤剝，將有愈來愈多的農民群眾擺脫“拿破侖觀念”的腐蝕。農民的理智，他們的被正確理解的利益，他們和資產階級之間矛盾的發展，——這一切必然會使農民同工人階級採取一致的行動。馬克思寫道：“……農民就把負有推翻資產階級制度使命的城市無產階級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領導者。”（見本卷第 221 頁）

馬克思的這一結論是他在“法蘭西階級鬥爭”中就已表述過的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工農聯盟這一思想的發展。從 1848—1849 年

革命战斗的全部經驗中得出来的这个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在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得到了更全面的論证。

关于資產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革命的根本差別这一天才的思想，是馬克思这个著作中所做的重要的理論概括之一。无产階級革命同資產階級革命的区别在于它的宏偉的任务：它要彻底摧毁現存制度，把現存制度从根本上加以改造。資產階級革命总是倏忽即逝，很快就达到它的极点。而无产階級革命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彻底性，它經常批評自己，从来不滿足于既得的成就，不怕揭露自己的錯誤并勇于改正錯誤，它不可遏止地一往直前。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提出的关于无产階級革命同資產階級国家的关系的原理，具有特別重大的理論意义和政治意义。在这里，馬克思根据革命的經驗和教訓作出了非常重要的結論，丰富了他关于国家，关于无产階級专政的学說。馬克思以法国的历史为例揭示了資產階級国家的本质、它的特征、它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并且得出結論說：一切資產階級革命都沒有动搖还在君主专制时期就已形成的集中的軍事官僚国家机器，而是使它更适合于鎮压被剝削階級。“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見本卷第 216 頁）无产階級革命所需要的是完全不同类型的政权和国家的集中，决不能原封不动地保留这种寄生性和剝削性的鎮压群众的工具。馬克思认为无产階級革命在对付旧的国家机器方面的任务，就是要“集中自己的全部破坏力量”来对付旧的国家机器并加以摧毁。弗·伊·列宁写道：“馬克思主义在这一段出色的論述里比在‘共产党宣言’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該书中，国家問題还提得非常抽象，还只是最一般的概念和表述，而在这里，問題已經提得具体了，还做出了非常确

切、肯定、实际而具体的結論；过去一切革命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但是这个机器是必須打碎，必須摧毀的。

这个結論是馬克思主义国家学說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5 卷第 393 頁）

弗·伊·列宁着重指出，1848—1851 年革命的历史經驗是馬克思这一重要的結論的基础。“馬克思的学說在这里也像其他任何时候一样，是由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識闡明的經驗总结。”（“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5 卷第 394 頁）

恩格斯的文章“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在內容上是和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相銜接的。在这篇文章中也揭示了在法国所以能建立起波拿巴制度的原因，它的本质和它固有的矛盾。恩格斯駁斥了想把政变的責任推到法国无产階級身上去的資產階級作家和新聞記者。恩格斯一方面指出，由于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性，在 1848 年 6 月遭到失敗的工人階級，被解除了武装，因而也就沒有现实的可能性来防止波拿巴独裁政权的建立，同时他也着重指出，无产階級对这个独裁政权采取了不調和的态度，他們要求尽快地恢复民主的自由。

收入本卷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流亡中的大人物”，在作者生前沒有发表，这是一部抨击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領袖，首先是这一派的德国代表金克尔、卢格、海因岑、司徒卢威等人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繼續他們还在 1848 年革命前就已开始的工作，揭露各种小資產階級流派思想和策略。他們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捍卫无产階級思想立場和策略立場的独立性和純洁性，使它們不受小資產階級的幻想和整个小資產階級思想的毒害。此外，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部著作應該說是对那些拼命

誣蔑和攻击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小资产阶级领袖們的一个直接的反击。

“流亡中的大人物”这部著作是出色地运用各种政治諷刺的写作方法——无情地嘲笑敌人，突出地表现所批判的现象的丑恶面——写成的，它无情地揭发了德国小市民阶层和他们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的恶行。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真正的艺术的表现力把这一伙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中的“大人物”的面貌描绘出来。他们明确指出这些人的庸俗的精神世界的空虚，哲学和政治观点的平庸和狭隘，他们所固有的在政治上的极端不稳定性，小资产者反复无常爱走极端的本性，他们时而奴颜婢膝地献媚，时而又附和和无政府主义的假革命的叫嚷。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部著作里揭开了德国小资产阶级领袖們的流亡生活的紗幕，描绘了在原則性爭論的幌子下所进行的无謂爭吵的令人厌恶的景象，马克思恩格斯无情斥責各种泛泛空談、用革命的詞句蠱惑人心、把政治活动变成爭权夺利的場所的现象。流亡者的这种叫嚷使德国政府在國內进行逮捕和迫害有了适当的借口。小资产阶级的领袖們把偉大的革命事业貶低和庸俗化，这正合反革命势力的心意。这就是“流亡中的大人物”这部著作所得出的主要結論。

由于在德国許多工人运动活动家被逮捕，普魯士政府策划了科倫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战友在1851—1852年的好几个月里，一直忙于营救被告并揭发普魯士政府和警察当局对付共产党人的无耻手段。收入本卷的許多声明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科倫案件而在报上发表的。在这些声明以及恩格斯的“最近的科倫案件”一文中，特别是在马克思的“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这一著作中，都充分揭露了这个案件是通过警察局的奸細密

探活动、伪造证据、凭空捏造等等卑鄙的手法制造出来的。这一著作在反对警察局和法庭陷害革命階級的代表，反对它們卑鄙地迫害进步活动家方面，到现在仍旧是一部具有很大的揭发力的文献。馬克思在全世界面前不仅是科倫被告的辯护人，而且是控訴人。他不仅揭发了这个案件的直接組織者的犯罪行为，而且譴責了整个警察官僚国家制度，整个腐朽的普魯士国家体系。

馬克思无情地揭露普魯士司法当局的偏頗不公，资产階級的“公正裁判”的階級性。作为被告站在资产階級法庭上的革命无产階級手无寸铁，因此被告是事先就被定了罪的。科倫案件以及其他案件都清楚地說明，“陪审法庭是特权階級的等級法庭，建立这种法庭的目的是为了用资产階級良心的寬广来填补法律的空白”。（見本卷第 536 頁）

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反駁了加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的所謂图謀不軌的这种莫須有的罪名。他指出，冒險主义的密謀的策略是同組織无产階級政党和培养无产階級階級意識的真正任务不相容的。馬克思以維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破坏活动为例，证明了这样的策略的結果是脱离群众，給工人运动带来損害，并为警察当局的好細活动造成有利的条件。馬克思指出，与政治上的冒險主义和宗派主义相适应的，就是用唯意志論和主观唯心主义偷換唯物主義世界观，把所希望所想像的条件当作革命斗争的现实条件。在 1850 年 9 月 15 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馬克思发言反对維利希—沙佩尔集团那种号召立即进行武装起义以便无产階級夺取政权的冒險主义立場，他发挥了这样的思想，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和革命本身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工人階級应该在这个过程中改造自己。“……我們对工人說：不仅为了改变現存